

高牆外的“孤兒”：困住服刑人員子女人生的“無形牢籠”

一場重病，讓父子二人以不同的方式被分別“囚禁”起來。

從11歲開始，劉立的生活空間就被壓縮到了一間約15平方米的小房子裏。

這個今年14歲的男孩患有重癱肌無力，已輟學多年。

他的父親參與走私被抓後，母親出走，這個家也就徹底破碎了。

如今，劉立的生活中只剩下70歲的奶奶與他相依為命，二人靠低保與救濟金度日。盡管過得清苦，但在奶奶看來，在某種程度上，劉立要比其他同類的孩子幸運一些，“至少他聽不到外面那些風言風語”。

45歲的陳芳曾感受過“風言風語”所帶來的歧視與壓力。自從2009年丈夫因過失殺人入獄後，她獨自一人帶着一對兒女挺過了12年。她說，這些年她最多時打了四份工，經常被人議論、遭人排擠，就連上小學的女兒也沒能逃過同學的調侃，“我很怕會給她造成心理陰影。”

與劉立奶奶一樣，陳芳也曾“自覺”地將自己的孩子劃離普通人群，稱之為“這類孩子”，司法部2006年的相關調查中曾對他們做出統計稱，46萬在押服刑人員有未成年子女，數量已超60萬人。

此後15年間，這一數據雖未再公布，但各地的統計工作並未懈怠。據福建省教育援助協會的一份調查研究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10月，福建省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總數已達17922人。上述報告稱，服刑人員的未成年子女中，輟學率26.9%，心理問題發生率29.5%，網癮、烟癮等不良行為發生率22.4%，觸法行為發生率21.2%，部分已淪為“事實孤兒”。

消失的父親

在福州市30多攝氏度的高溫下，劉立床前兩臺電風扇因為停電早已停轉，床邊的地板上放着一把白色醫用尿壺，壺口處連着一根長長的導尿管，空氣中泛着潮，夾雜着一股淡淡的異味。

5月12日上午，14歲的劉立半躺在床上隨手翻看着一本《素描基礎教程》，他說，那是媽媽買給他的，但他已經不記得多久沒有見過媽媽了。

早從半年前開始，劉立的家裏就只剩下他和奶奶付英兩個人了。2021年2月11日，祖孫二人在一棟親戚“借給”他們的老房子裏，過了一個冷清的除夕夜。劉立覺得奇怪，他不知道父母去了哪裏，他想問奶奶，但最終沒有開口。

大約在春節前兩個多月，劉立的父親因為走私油料被公安機關抓獲，此後不久，他的母親也不知所終了。

付英今年已經70歲高齡，她回憶稱，家裏在劉立6歲前還是“像個家”的，盡管日子過得清貧，但終歸是過得去。變故發生在2011年，那一年，劉立被查出患有重癱肌無力，家人曾帶他四處求醫，從福州到上海再到北京，他們花光了積蓄，借遍了親友，但沒能遏制住病情的惡化。6年後，劉立11歲，已無法行走，最終輟學在家，從此再也沒走出過自己那間約15平方米的小房間。

付英回憶，劉立輟學後，他父母逐漸接受現實，不再對孩子的病情抱有幻想，盡管家中開銷不像此前求醫時那麼大，但欠下的外債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天文數字。幾年前家中房子坍塌，一家人拿不出修房錢，最終搬進親戚的一處老宅，才勉強有了落脚地方。此後幾年間，劉立父母都在為生計奔波，父親為了還債常年在外打工，通常幾個月才回一次家，家人都不知他究竟在幹什麼。

2020年11月，付英突然接到消息稱，劉立父親因涉嫌走私罪被公安機關抓獲。此後不久劉立母

親便獨自離家，至今音訊全無。付英說，自從兒子被抓後，劉立從未問過他父親的狀況，剛出事的那段時間，家裏曾陸陸續續來過一些人，提過這件事，“我是想瞞着他，怕對孩子造成傷害，但我想他大概是猜到了，他沒有問，我也不敢說。”

如今，劉立已經與奶奶相依為命半年多，靠着每月五六百元的低保度日，社區的工作人員及公益機構的社工會上門慰問。付英說，經濟上的困難對他們來說都不算什麼，最難的是，隨着自己年紀越來越大，她已沒有辦法獨自照顧癱瘓在床的孫子，“我不知道他媽媽在哪裏，也不知道他爸爸會被判多少年，如果我走了，孩子該怎麼辦？盡管父母都還活着，但實際上他已經是個孤兒了。”

塵封的家書

一場突如其來的重病、一宗無從問及的犯罪、一次毫無徵兆的出走，劉立原本圓滿的家庭就這樣徹底破碎，他的人生軌迹也就此發生改變。

9歲的林豪與劉立有着相似的經歷，他在出生僅半個月後，就被查出膽道閉鎖，甚至曾被“宣判死刑”稱，若得不到有效治療，可能活不到一歲。

“有效治療”四個字在短短一年時間裏掏空了林豪父母的所有積蓄，他活了下來，但後續治療仍是個無底洞。林豪的媽媽吳惠回憶稱，林豪出生後，家裏的經濟壓力劇增。2013年8月，林豪的爸爸因販毒被公安機關抓獲，之後被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吳惠在提及過去8年自己獨自帶着孩子求醫的經歷，仍忍不住流淚，不知自己是怎麼挺過來的。林豪目前經過一次手術後病情已經穩定，但膽道閉鎖要終身吃藥，最終要肝臟移植，“我不知道孩子爸爸什麼時候能出來，也不知道我們能扛到什麼時候，我甚至顧及不到孩子在父愛缺失的情況下會不會出現性格缺陷，親情對於我們這類家庭來說，有些太奢侈。”

“親情奢侈”的說法在56歲的徐應蘭看來，雖然無奈但却是爭不爭的事實。她在小兒子因犯信用卡詐騙罪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後，一手將孫子小雨拉扯大。過去的4年間，盡管兒子多次提出，希望徐應蘭能將小雨帶到監獄探視，但都被她拒絕，“我不想讓孩子知道他爸爸在監獄坐牢，就連他寫的信我都會小心藏好，不敢讓孩子看到。”

徐應蘭回憶，2012年，小雨的媽媽剛懷孕不久就被查出患了腦瘤，“小雨出生後不久，我丈夫又發生車禍。”一系列突變讓小雨的爸爸倍感壓力，從2014年開始，他辭掉了超市的工作外出打工，之後便很少回家。直到2016年底，家人收到公安機關的拘留通知書後，才知道小雨爸爸犯了法。

小雨爸爸被抓後，他媽媽的病情也越來越重，很快連路都走不了了，一家人無奈之下將她送回娘家，由娘家人照顧。如今，小雨已經9歲，在他的記憶中，早已不記得爸爸的樣貌。徐應蘭說，過去的4年多時間裏，小雨爸爸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寄信回來，幾乎每一封信中都會提到小雨，並多次請求父母帶小雨來探視，但小雨對此毫不知情，“我知道他想孩子，但我不敢帶小雨去”。

在徐應蘭的家中，小雨爸爸寄回來的一封封信件被包得嚴嚴實實藏在櫃子的最高處，她說，小雨現在已經識字了，她不能讓他看到那些信。最近這一年，徐應蘭總是會時不時盯着大門的門縫看，她說，郵局的人有時候會把信從門縫裏塞進來，這讓她很擔心。在徐應蘭心裏，兒子的信中書寫着小雨缺失的父愛，也藏着可能奪走小雨童年的“惡魔”。

樹與根

在近日的走訪中發現，對於大部分服刑人員子女來說，親情缺失是常態，與之相比，還有少數孩子曾面臨無人撫養的困境。

在過去整整4年時間裏，魏剛從未主動提到過自己的父母。2017年，魏剛的父親突發疾病去世，在他倒在大樹下那一刻，魏剛徹底變成了一個孤兒。

魏剛的一名遠親曹利蘭說，魏剛的奶奶在他父親病逝前兩個月剛過世，那時候魏剛的家裏已經沒有人了，他的母親在幾年前因為殺害親生女兒被判入獄。是曹利蘭力排眾議，抵住來自家裏所有人的反對，收養了魏剛，“那時他已經5歲了，却還不會說話，不會搞個人衛生，甚至不會自己吃飯。”

在曹利蘭的印象中，魏剛的家從他的母親何歡改嫁過來後，就已經處於病態了。她說，何歡在嫁入魏家前就與前夫生下一個女兒，二人曾商議一起偷渡到國外生活，何歡為此從親友處借來一筆錢，先將前夫送了去，却不想對方走後便再無音訊。慘遭拋棄的何歡此後患上了精神病，在改嫁前就已經不正常了。

變故發生在魏剛出生的那年，2012年魏剛出生後不久。一天，何歡在帶女兒外出時，將女兒推下河溝淹死了。案發後，經司法機關鑒定，法院認為何歡在案發時未處於發病狀態，她也因此被判入獄。

魏剛的家自從何歡被抓的那一刻開始，就已經變得一團糟。據當地村民介紹，魏剛的近親屬大多都有智力障礙，魏剛出生後便一直處於無人照顧的狀態，爸爸和奶奶都不會照顧孩子，致使魏剛長到5歲還什麼都不會。

曹利蘭到現在也不確定魏剛的父親究竟是怎麼死的，她猜測可能是死于腦溢血或心臟病之類的突發性疾病，村裏人對於魏剛父親的死，大多祇有一個模糊的印象——2017年夏天，他帶着魏剛走到村口的大樹下時突然就倒下了，後來有村民上前查看時才發現他已經死了。那時，魏剛祇是在父親身邊愣愣地站着，沒有驚慌，也沒有悲傷。

曹利蘭記得，魏剛父親的喪事辦得十分簡單，她作為遠親前去吊唁時，注意到了年幼的魏剛，看着他傻傻愣愣的樣子，曹利蘭心裏一陣心疼。一番打聽之後，她知道過去5年裏，魏剛一直處於“散養”狀態，近親屬們也沒有人願意撫養他。當晚，曹利蘭就把魏剛帶回了自家，“我不能看着這孩子就這樣在外面流浪，也不能讓魏家這一脈在這裏斷了根。”

“不能斷了根”在之後成了曹利蘭面對家人反對時說過最多的一句話。經過四年的細心照料，魏剛現在看上去已經與普通孩子無異，但曹利蘭知道，魏剛終究還是與其他孩子有些不同，他在被提及父母時表現出來的沉默，讓曹利蘭感到擔心。她說，每當這個時候孩子都會想到村口的那棵大樹，“孩子心裏可能已經有了陰影，我以前覺得他那時小不懂生死，現在看來他心裏什麼都知道。”

缺位與彌補

曹利蘭開始留意魏剛的心理問題，是從幾年前他帶魏剛去監獄探視母親何歡時開始的。她說，決定告訴他母親的入獄情況前，她曾猶豫過，但最終還是決定告知真相。曹利蘭記得，魏剛第一次見到母親時，母子倆都表現得十分沉默，幾乎什麼都沒有說，之後的幾次會面情況也並沒有太大好轉，“我想他們缺失的親情大概很難補回來了。”

吳永才同樣面臨着親情修復的難題，這個45歲的中年男人在12年前因過失殺人被判入獄，那時

他的女兒還未滿月，他在事發後匆匆回了趟家，甚至沒來得及多看女兒一眼，就前往公安局自首了，留給妻子陳芳的，是兩個未成年的孩子和滿地的狼藉。

據陳芳回憶，2009年女兒剛出生時，丈夫與公公同在一個建築工地打工，因公與工友發生口角，丈夫吳永才事後找對方評理，不料起了衝突失手將對方打死了。陳芳說，事發時她還在坐月子，吳永才出門前她曾勸他不要去，但沒能攔住，“我是在晚上接到工友電話時才知道出事了，他中途回來時已經把人打死了，但什麼也沒有和我說。”

吳永才與其父親之後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和7年，陳芳不得不在坐完月子後就外出打工謀生。她說，丈夫與公公雙雙被抓，自己母親去世得早，娘家也沒人能幫得了她。那段時間，為了養活兩個孩子，她不得不去綉花廠找工作，將刺綉帶回家裏趕工，最多時，同時打了4份工。

因工作強度太大，陳芳的身體逐漸出了問題，受頸椎病影響，短短幾年後她便無法伏案工作。為維生生活，陳芳去掃過馬路，也撿過廢品。她說，丈夫入獄那幾年，經濟上的困難和身體上的重壓對她來講都可以忍受，最難熬的是受到來自身邊人的歧視和排擠，甚至有人當眾對她進行言語侮辱。

陳芳說，在過去的十幾年裏，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她都咬牙堅持着，但唯獨面對女兒時，她感覺到一股深深的愧疚。每次學校開家長會，都是哥哥陪着她去，尤其是當陳芳獲知有同學用爸爸坐牢的事情調侃女兒時，她幾乎要崩潰，“說實話，那時候我很恨他（丈夫）。”

之後，陳芳從同鄉處聽說，有同鄉的孩子因為父母坐牢被同學孤立，不敢和人說話，她開始時常與女兒談心，教她做人的道理，甚至說服自己帶着女兒去監獄裏探視，想以此打破爸爸在女兒心目中“壞人”的形象，“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她始終沒有主動提起過爸爸。”

2020年11月，吳永才經過4次減刑後出獄。他說，自己在服刑期間每天都很想孩子，他努力改造爭取減刑，就是想早點回家，彌補自己對孩子們缺失的父愛，但當這一天真正到來時，他突然發現，自己在女兒的生命中缺位太久，已很難彌補。

無形的囚牢

吳永才至今仍對女兒學校的親子活動耿耿於懷。他說，在獄中服刑時，妻子曾不止一次提到過此事，他曾暗下决心，等出獄後一定要以父親的身份，陪女兒參加一次親子活動。

出獄已半年有餘，一家人曾經期盼的親子活動却沒有人再去提及。吳永才說，服刑的這些年，妻子和子女們都過得很苦，他很想彌補但找不到方法，現在祇能通過努力賺錢表達對他們的歉意，但這對

于孩子情感和心理上的創傷修復作用十分有限。

中國婚姻家庭諮詢師、福建省助困公益協會副會長黃驥表示，她從2014年開始關注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並在多年的工作中發現，這類孩子除了物質、經濟上的困難外，多數曾在外遭到歧視、孤立，部分孩子在家同時充當着“出氣筒”的角色，他們很容易被當成異類和負擔，通常情感壓抑，不敢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情緒。

黃驥說，有半數以上服刑人員在入獄後，另一半都離開了原有的家庭，孩子在之後便淪為“事實孤兒”，從而產生委屈、封閉、自卑、憤怒、對立、疏離、逃避等心理問題，如同被關進一個無形的囚牢，很難自行解脫。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被稱為“事實孤兒”的特殊群體數量不少，司法部曾在2006年公布相關調查稱，我國在當時有46萬在押服刑人員有未成年子女，總數超過60萬人。此後許多個人與組織先後針對這一群體進行調查研究，並得出結論認為，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輟學率、心理問題發生率及不良行為發生率均高于普通未成年人，部分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由于遭受歧視，表現出學習困難、輟學、人際關係障礙等問題。

據福建省教育援助協會2018年作出的一份《福建省在押服刑人員及其未成年子女基本狀況調查報告》顯示，該協會曾對福建省18個監獄有未成年子女的在押服刑人員進行調查，統計結果顯示，約80%有未成年子女的事務人員正處於青年期，其未成年子女的輟學率為26.9%，心理問題發生率為29.5%，網癮、烟癮等不良行為發生率為22.4%，觸法行為發生率為21.2%，其中59.3%的家庭總體經濟較差。

上述報告稱，福建省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有66.1%處於小學階段，31.5%處於中學階段，輟學率遠高于國家統計局在當時公布的15.5%的數據。同時，他們的心理問題發生率、不良行為及觸法行為發生率都遠高于同齡青少年群體，這可能與父母的服刑有重要關係。

該協會一名工作人員介紹，盡管國家層面關於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總數自2006年後沒再更新，但各地的統計工作一直在推進，截至該協會2018年10月作出上述調查報告時，僅福建省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總數便達到17922人。

針對這一特殊群體，福建省教育援助協會曾在上述報告中建議，完善我國未成年人保護體系，成立由民政部門牽頭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聯動機制，發揮國家救助的作用，同時積極總結全國各地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救助的民間組織和社會團體經驗，扶持專業化社會組織，促進對這一群體救助機制的完善。

（注：為保護未成年人隱私，文中人物除黃驥外均為化名）



小雨爸爸在獄中寄回家裏的信。